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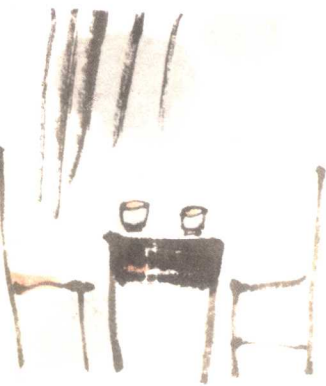
开卷文丛

主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



开卷闲话

子

聪

凤凰出版社



开卷闲话

子 聪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卷闲话/子聪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3. 10
(《开卷文丛》第一辑/蔡玉洗主编)

ISBN 7-80643-673-1

I. 开... II. 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826 号

书 名 开卷闲话

著 者 子 聪

责任编辑 胡慧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7.25

插 页 6

印 数 1—35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673-1/I·166

定 价 14.5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开卷文丛》第一辑

编委会名单

王振羽	卢冬梅	刘俊
赵允芳	钱军	徐雁
徐雁平	唐爱平	钱晓华
董宁文	蔡玉洗	薛冰

主 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

封面国画

刘二刚



来新夏序

近年来,在六朝金粉之地,竟然有一批说老不老,说小不小的读书人聚到一起,组织了一个“凤凰读书俱乐部”,又出了一份小刊物《开卷》。真是上帝仁慈,这些人赶上了好时候,要是倒回二十多年,只要有某小人稍微撇一下嘴角,“凤凰读书俱乐部”就可定为“裴多菲俱乐部”,《开卷》无疑也是非法刊物,诸位读书人也就吃不了兜着走。而今好了,诸位时不时地聚坐在高处不胜寒的俱乐部里,品茗高谈,阔论书与人。融融陶陶,忘却世间烦扰,令人艳羨!

《开卷》的确是份好刊物,没有烟火气,没有铜臭味,只是一群痴人在说梦。寒舍有多种刊物,能耐心从头看到尾的只有《开卷》,但每期在目录页上看到“苏新出准印 JS—1106 号”时,总感到一点微憾,总会联想到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水到渠成地想结婚,只是一时领不到正式结婚证,于是只得邀集三朋四友,街道乡邻,摆桌喜酒,说明情由,取得共识,发个“准印”,随

之而来的就是添丁进口,若以法律为准绳,这孩子虽有其法定地位,但终究是非婚生子。至今,《开卷》这个已经会说话,满地跑的非婚生子,该有个正式身份了吧!我常梦想不知哪一期的目录页上突然出现 ISSN 之类的正式刊号,我必馨香拜祷,上苍佑人!

《开卷》有名家名篇,也有不熟悉书友的用心之作,但都是实实在在的好文章,没有学究气,没有八股气,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文笔自由洒脱,多性情中语,让人爱看、喜欢看,特别是书尾连载的《开有益斋闲话》更是我每期必读之篇。开始是想从中获得些有关书和书友的信息,渐渐积多了,就日益显出其价值。从学历史的角度看,首先感到这是一种编年体著述,如果是为皇上写的话,那就类似起居注。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开卷》的起居注。几年下来,再浏览一过,不仅看到名人游踪,书话议论,书友音问,长短信息,而且预想到日后可作文坛、书坛考证史事之资。作者虽署名子聪,但并非一人,而是创办《开卷》那批读书人的集体创作,所以信息渠道深广,视野四面八方,较多地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所以也是《开卷》发展成长的实录,越来越让人深感有保存的价值。如果能将《开有益斋闲话》中的一则则简讯,以年月为序,汇成一编,减免读者翻检之劳,岂非善举?

正在思量,收到《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君的来信,他是《开有益斋闲话》主要执笔人之一,他说准备将《开有益斋闲话》编成一书,更名《开卷闲话》,他没有解释更名的理由。据我的妄加猜测,一则《开有益斋闲话》与清人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记》有重名沿袭之嫌,二则更名《开卷闲话》更足以表明其代表

性。他不遗在远，邀我为《开卷闲话》作序。我作为《开卷》的原始读者，自当应承。我赞同其事，乃应董君之请，略叙所见，以为之序。

二〇〇二年初冬写于南开大学遵谷





舒芜序

4

“文革”之后，举国兴起读书热，在报刊上有明显反映。刊物方面，《读书》杂志首揭“读书无禁区”之旗，继起的我经常能看到的有《书城》、《书屋》，间或看到的还有《博览群书》、《读者》等等。报纸方面，出现了“读书报”这样先前未有的品种，《文汇报》首领风骚，继起的有《中华读书报》等等，全国报纸上更纷纷开辟“读书”一类的副刊。《开卷》杂志出世最晚，别出蹊径，以朴素清新的小刊，遥嗣《语丝》的风调，成长至今，可持续发展之势已定。还拓展开去，要出《开卷文丛》，其中有《开有益斋闲话》一种。这本来是《开卷》每期的编后记，写得很有“开卷”之气，为读者所爱，现在合出一集，当更受欢迎。董宁文先生来信命序。我回信说，请待我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不切题的意思，再作答复。

话这么说，还是免不了绕着“开卷有益”的题目想来想去：开什么卷？有什么益？有什么害？对谁有益？对谁有害？想

不出头绪，随意整理案头，书丛中抽出一本笔记，上面题着《读列宁全集》字样，顿时有了，好，就来谈这个。

那是“文革”之初，我几年的“牛棚”生活里面，有一小段时间“放回群众中间”。每天依旧上下班，当然无公可办，我以待罪之身，只能小心翼翼地埋头读书，读的就是《列宁全集》，居然从第一卷读到第十九卷，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我是一条一条地摘录原文，每条加上我概括的标题。今天来看，绝大部分是符合当时的主旋律的。然而却有一些不和谐音，例如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些标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需求水平的增长，这是一个进步的现象

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为什么是进步的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革命作用

把资产阶级看作偶然出现的“奸诈之徒”，就会否认阶级斗争

怎样看待局部的改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资本主义是进步现象

资产阶级怎样破坏了中世纪的剥削

怎样通过“合法”斗争来揭露“法”的本质

正确评价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

继承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遗产

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农奴制的进步意义

农业中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性

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

大机器工业吸引女工童工的进步意义

《列宁全集》头几卷的中心是反对民粹主义，所以强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进步历史作用，不足为奇。我摘录这些，却是在“文革”初期，舆论一律，铺天盖地，抹杀一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任何进步作用，抹杀一切合法斗争和改良主义的任何进步作用的背景之下，这就有点特殊的心态。

例如，当时的指导理论，笼而统之地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妖魔鬼怪化，似乎他们都是一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资产阶级剥削镇压劳动人民出谋划策的。我在“正确评价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这一条下，抄录的却是这样一段：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我们究竟

拒绝什么遗产》，一八九七年底，全集二卷四二四—四二五页）

假如我当时竟然幼稚到在学习会上，提出这个论点，作为我自己的意见，肯定会遭到猛烈的批判，说我胆大包天，公然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假如我举出列宁的名字，肯定加上一条“歪曲伪造导师言论”。

后面各卷，没有这么多批判民粹派的言论了，我大量摘录的，全是“反对修正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平过渡’是反动的有害的空想”之类。即使有人来检查这个笔记本，我也不怕。可是，在林彪倡导下，当时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成风。我却在“通俗和庸俗”一条下，抄录了这样一段：

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通俗作家的对象不是那些不动脑筋的、不愿或不善于动脑筋的读者，相反地，他们的对象是那些确实愿意动脑筋、但还不够开展的读者，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件重大的和困难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开步走，教会他们独立地继续前进。在庸俗作家眼里读者都是一些不动脑筋，也不会动脑筋的人，他不是启发读者了解严整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畸形的简单化

的充满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枣就行了。(《评〈自由〉杂志》,一九〇一年秋,全集五卷二七八—二七九页)

假如当时我公开说,背诵语录,立竿见影,很像是一些不动脑筋,也不会动脑筋的人,将一些畸形的简单化的东西,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枣,仙丹似地吞服下去就行了,肯定会以“恶毒攻击”之罪被抓起来。

又如,当时的指导理论否认历史上统治阶级有任何让步,只承认有反攻倒算。我则在“改良措施的两面性”标题下,摘录了这么一段:

改革能够当做预防性的反动,也就是说,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被自己的撰稿人揭穿了司徒卢威先生》,一九〇三年四月一日,全集六卷三二三页)

明明白白地肯定了改良是有的,而且有“多少改善革命阶级处境”的作用一面,纵然是次要一面。

甚至直到第十九卷,我还在“只有独立的功夫才能判明争论的是非”的标题下摘录了这么一大段:

怎样去寻找真理呢?怎样弄清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论断呢?

每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如果为着某个问题而发生热烈的斗争,那么为了确定真理,就不要只看争论的双方的声明,而要自行审查事实和文据,自行考察,看看有无证人的口供以及这些口供是不是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几个争论问题》,一九一三年四月,全集十九卷一三五—一三六页)

为什么不嫌繁冗地抄上这些,当时恐怕自己也说不清,现在回顾,下意识里显然是对于“大字报”“大批判”的蛮横武断文风的反感。

今天对列宁理论如何研究,是另一问题。而当时即使是读列宁,也会读出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便不敢反对的结果,则是事实。一边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边也就有利于后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难怪要以“一句顶一万句”,来作扬此抑彼、重此轻彼的釜底抽薪之计了。

过去听说中世纪教会,禁止将《圣经》普及到人民中去,总觉得难于理解。重检这本《读列宁全集》笔记,可以有解答。

话说回来,仍然是“读书无禁区”。时候不同,“禁区”不同,只要你开卷,终归会有益。尽管最初高举“读书无禁区”旗

帜的《读书》杂志,已经革除“文人气”而日进于学术之林,非复“读书”可限。我用“读书无禁区”来注解“开卷有益”,这个卷还是可以交得出去的吧。是为代序。

二〇〇二年十月九日,舒芜在北京





陈子善序

南京有座凤凰台饭店，凤凰台饭店里设了个“凤凰读书俱乐部”，“凤凰读书俱乐部”办了份《开卷》月刊，不知不觉，已有整整三个年头了。

《开卷》虽小，容量却不小，影响更不小，不但在国内，就是在海外也有点名气。每期薄薄二十八页，刊载的文章大都是短小的千字文，但说的都是真话、实话，不卖弄学问，不故作高调。老一辈的文人墨客可以在《开卷》上谈心叙旧，中青年作家学者也可以在《开卷》上各抒己见。综观当今的各式各类刊物，能做到这一点的已经不多了。

在《开卷》的文章中，最吸引我的是“开有益斋闲话”（以下简称“闲话”）。这不只因为“闲话”作者是我的朋友，更因为“闲话”信息量大，历史现实，人文学术，无所不谈，无所不包。不但南京当地的文坛活动在“闲话”中有充分的反映，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出版动态、作家行踪，“闲话”也常有

披露。我每次拿到《开卷》，总要先把“闲话”快读一遍，原因也在于此。

“闲话”者，按《辞海》的解释，闲谈之意是也。在我看来，《开卷》“闲话”就好比是一个“聊天室”，竭诚欢迎各方人士前来闲谈。“闲话”构筑的其实是一个人文学术交流的平台，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诗意地安居的场所。这从每篇“闲话”都要摘录全国各地大量的读者来信就可看出，“闲话”作者的良苦用心也由此而彰显。至少我自己就从“闲话”中获益良多。许多识与不识的关心人文学术的朋友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从“闲话”中就有所了解，有所领悟。“闲话”大大缩短了我与这些朋友空间上的距离，读“闲话”就好比与这些朋友作一次学术的切磋、心灵的对话。

《开卷》“闲话”的文字是朴素的，平实的，不张扬，不剑拔弩张，甚至有点“述而不作”的味道。当然，“闲话”作者不是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坛学界的现状，哪怕是不同的观点，批评的意见，也往往照录不误。这是我特别爱读“闲话”的又一个原因。

与已经广受读书人青睐的浙江嘉兴秀州书局《笑我贩书》相比，“闲话”有自己的风格。《笑我贩书》以透过书店的小窗口广录社会百相、博采世态人情见长，“闲话”记录的和所反映的似乎狭隘些、纯粹些。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闲话”又何尝不是当前这个唯商为大、唯利是图的社会里一批坚守人文的知识分子情感的倾吐、灵魂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闲话”与《笑我贩书》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当年陈西滢以为《现代评论》撰写“闲话”专栏文字而声